

为敢担当干部撑腰 才能啃下“硬骨头”

本报评论员 张世光



长沙市有关部门为被举报后查明没问题的干部撑腰，是在旗帜鲜明地肯定、鼓励那些惯于守法纪、勇于冲在前、敢于动真格、善于啃“硬骨头”的干部。此举应该会激励更多干部在面对相关改革难题、遇到“硬骨头”时，敢作为、勇担当，更将有助于弘扬起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

据人民网8月20日报道，近日，湖南省长沙市纪委监委对外通报7起典型案例，及时为被举报不实的干部澄清正名。这些案例中，有的因对损害国有资产收益的拖欠行为勇于说“不”而受到告诫；有的在执纪执法岗位敢于担当而“得罪人”，有的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坚持原则、拒绝不合理诉求而受到诬告；有的在工作岗位兢兢业业、敢抓敢管而受到质疑，等等。为这些敢担当的干部澄清事实、还之以清白，体现了各级党委和纪委旗帜鲜明为敢当的干部撑腰鼓劲的决心和鲜明态度。

被举报的干部经过调查没问题，公开的通报让想干事、敢干事的干部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纪检监察部门为这些有担当干部撑腰，将会鼓励更多的干部敢于向改革中的“硬骨头”发起挑战，将改革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而敢啃“硬骨头”，往往是有风险的。新闻中不难发现，几位干部被投诉都是因为触碰了“硬骨头”——土地纠纷、执法行为、信访维权、国有资产处理，都是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处理得好坏不仅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更事关一方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改革进程中的“硬骨头”或因问题长期存在、新官不理旧政而被长期搁置，或因相关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而长期难以解决。啃下这些“硬骨头”，没有点儿“粉骨碎身全不怕”的勇气和担当是难以想象的。在此过程中，想要不得罪人、不触碰某些既得利益也是不可能的。

清者自清。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被举报的几位干部不是有问题，而是真真正正

查问题、规规矩矩办问题、老老实实没问题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能被处理，而且应该被大量期待与需要。

必须承认，以往对于被举报最后调查确认没问题的干部的处理，一些地方有大事化小、小事化大的倾向，或是在一定范围内低调处理。这种做法一方面确实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方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一些心怀不轨的举报者的嚣张气焰。如此一来，往往会让一些本来想干事、敢干事的干部受到打击，甚至还会让一种“不干事就不会出事”的消极态度蔓延开来。

此次长沙市有关部门为被举报后查明没问题的干部撑腰，是在旗帜鲜明地肯定、鼓励那些惯于守法纪、勇于冲在前、敢于动真格、善于啃“硬骨头”的干部。此举应该会激励更多干部在面对相关改革难题、遇到

“硬骨头”时，敢作为、勇担当，更将有助于弘扬起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普通百姓也会对相关领域改革的复杂艰难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与判断，对敢作为、有担当的干部有更多的认同。

革故鼎新的过程总是与困难甚至风险相伴。面对这些重重矛盾，有担当的干部选择了栉风沐雨，而不是躲风避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肯作为、善作为、有担当的干部，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一步步推向前进。

扫描二维码
关注“钟鼓声”，看
工人日报“钟鼓君”评论。



小学入学年龄 慎言“弹性制”

陈广江

每到升学季，都会牵动许多家长的心。因为“差了几天，就要等一年”的家庭并非个例，许多孩子出生在8月31日以后，不符合年满6周岁入学年龄要求。有专家建议弹性设置入学年龄，不将标准设定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见8月21日《法制日报》)

为了让孩子满足条件，有的孕妇不惜提前剖宫产，有的家长更是冒着涉嫌犯罪的风险篡改户口信息。其实，问题早就存在，既然“一刀切”的弊端有目共睹，而且一些发达国家也实行弹性入学制，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弹性设置入学年龄？

目前实行弹性入学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且不说入学年龄“松绑”后学位需求发生变化，教育部门和学校难以应对，单就社会普遍“抢跑”的非理性心态而言，弹性入学制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设想一下，松动入学年龄限制，最可能的结果是大家“能早尽早”，更多孩子扎堆提前入学。这与初衷背道而驰，会加剧“抢跑”的焦虑情绪。

此外，要实行弹性入学制，必须修订现行《义务教育法》。虽然该法规定的是年满6岁的孩子应该入学，而不是未满6岁的孩子不能入学或者是年满6岁才能入学。但从法律执行看，孩子只有年满6周岁才能入学。所以，实行弹性入学制，修法是绕不开的。在争议较大的情况下，修法短期内难以通过。

入学年龄设置关乎教育资源分配，关乎广大家庭切身利益，关乎下一代健康成长，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8月31日”是一个维持多年的“铁律”，家长们早已习惯，民调显示超七成受访者表示赞同，而一旦松动限制必然引发更多担忧和质疑。

只要家长们放不下“起跑线”思维，松动入学年龄的建议就很难落地。摒弃“一刀切”，实行弹性入学制，还需综合考虑、从长计议，否则可能好心办坏事，比如可能助推早教“抢跑”之风，让孩子们负担更重，让家长们焦虑更深。

“两分钱处方”的看点不仅在于能够治好普通过敏症，更该在于引导公众通过正确看待“小处方”“微处方”来反思当下较为“过敏”的医患关系。以治疗费用、药物价格是否低廉作为评判一个医生医德的标准，是一个误区。换言之，今天对“两分钱处方”的盲目吹捧，可能成为将来对合理检查时的无端棒喝。

改善医患关系，说到底就是要努力改善医患双方的脆弱信任现状。人们心目中的医患关系，当然是既有精湛的医技，亦有高尚的医德。但期待好医生更多，需要患者及家属给予医生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倘若人们只对“两分钱处方”击节叫好，而质疑花费多但合理的诊治方案，如何能培植出双方互信？

由此而论，“两分钱处方”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去思考如何让医患关系“脱敏”，即缔造良好的医患互信关系。“仁心+信心”，这才是我们都想看到的结果。



忘年交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在浙江杭州，一养老院通过设置严格的入住条件，选出14名年轻人入住养老院。他们每月只需支付300元就能住进30平方米的“标间”，而住养老院的条件之一是当好志愿者，每月完成20小时的助老志愿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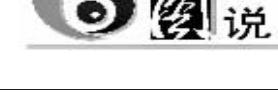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空巢老人成了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需要陪伴和精神关怀。有些城市倡导包括小朋友在内的年轻志愿者到养老院、社区去，陪伴老人做饭、聊聊天，让老人的生活不再单调孤寂，但缺点在于持续性差，老人获得感不足。如今，杭州这家养老院让渡部分房间和床位给年轻人，在没有占用太多资源的同时，创新养老模式，是一种有益尝试，值得其他有条件

的养老院学习。从长远来看，这也

是对养老产业如何融合其他优势

资源来升级发展的一种启示。

赵春青/图 嘉湖/文



培植医患互信，不必神话“两分钱处方”

司马童

“两分钱处方”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去思考如何让医患关系“脱敏”，即缔造良好的医患互信关系。

近日，河南郑州市民张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分享自己陪母亲看病的经历，医师开了3片朴尔敏，仅花费两分钱的经历。这则“两分钱处方”的消息引起网友热议，那位医师也被

网友们称为“中国好医生”。(见8月21日《大河报》)

药费仅两分钱，这在动辄几百上千元的看病买药语境下，让人倍感意外。患者和网友大呼惊讶的情形，折射出现在现实中略显“过敏”的医患关系。

从对症下药的角度看，“两分钱处方”并不奇怪。诚如该医师所言：“在平时工作中，开几分钱、几毛钱、几块钱的处方是常有的事，因为医生的本职就是治病救人，为患者开药是根据患者的症状找出最合适的方法。”

对于“两分钱处方”，的确不应过誉或神化。

现实中，并非所有疾病都能通过小处方检查和治疗。很多病症的隐蔽性较强，即使做了相关检查也未必能够立刻确诊，况且有些不同疾病的表现在症状大体相同，所以需要肉眼和仪器的相辅相成，医生让患者做些检查实属必须，不见得就是“钻进钱眼”的过度医疗。但也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和医院存在“能开贵药就不开便宜的”、不需要拍片却非得拍片等情况。这就说明，缺乏良好的医患信任，“两分钱处方”就容易成为“神话”。

“第一生产力”活起来了

(上接第1版)

多项措施激活“第一生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鞍钢集团领导班子对搞活“第一生产力”态度非常明确。

近几年，鞍钢密集出台相关措施。修订完善《鞍钢集团公司科研项目管理办法》《鞍钢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技术输出管理办法(试行)》《科研设计机构科技创新管理运行指导意见(试行)》《关于深化鞍钢集团钢铁研究所(鞍钢股份技术中心)体制改革的决定》等科技管理制度，推动各子企业及研发机构实施项目合同制、项目成果分享制，进一步提高了研究机构的经营能力，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出和产业转化。

一系列制度对科研人员给予了三个方面的支持：放权、给权、效益分享。

鞍钢股份科研管理处长王忠润介绍说，为调动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下放了三项权力，一是对外合作立项上，项目在2000万元之内的，科研单位自己做主；二是对外仪器、设备采购上，不再层层审批；三是工程投资3000万元以内的，不用层层审批。同时，还给科研单位及科研人员一些新的权利，钢铁研究院10个研究所所长兼任对应生产厂副厂长，如炼铁技术研究所所长兼任炼铁总厂副厂长、炼钢技术研究所所长兼任炼钢总厂副厂长。在21个主要生产制造领域由科研人员担任首席专家，享受公司经理正职待遇。还有科研机构招聘引进所需人才时，权力交给科研机构，对特殊人才可“议价”。为了帮助年轻科研人员迅速成长，钢铁研究院专门设立“青年创新支持资金”，每年拿出200万至300万元支持35岁以下科研人员进行课题研发。

还有一个让所有科研人员备受鼓舞的“分享制”。“科研设计机构科技创新管理运行指导意见(试行)”明确规定：“对技术输出项目产生净收入按不大于50%比例提取奖励，奖励技术输出主要完成人、其他协助推进进入员”“成果实施后的收益原则以5年为限，并采取逐年递减的方式累加”，如第一年提取20%，之后每年减5%，第二年可提15%。

“对于国内行业有领先的工艺和产品收益以10年为限，收益比例不递减”。还有科研人员中长期期权激励，在第6年兑现。

看见项目大家都抢着干

“现在看见项目，大家都抢着干。”集团市场技术总监关菊如此形容鞍钢好措施带来的变化。

锯条、链条、手术刀、弹簧片、发卡、纺织针……这些需要优特钢的产品，质量要求高、批量小。原来，这个市场基本被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占据。2015年10月，鞍钢专门成立了优特钢研发团队，开始进军这一市场。

鞍钢优特钢研发团队开始“揽活儿”时，一些企业感到奇怪：你们那么大企业能干这种小活儿？他们不相信鞍钢能放下身段干这种小活儿，也不相信鞍钢能按期交货。

为了打开市场，鞍钢优特钢研发团队首先盯准一家生产纺织针企业，一个月去三四次，研究他们使用的进口优特钢质量要求，之后按照高于进口钢材的质量标准生产出制造纺织针钢材，同时提供全过程技术服务。

鞍钢优特钢研发团队的诚意和产品质量，终于打动了这家企业，第一批和鞍钢签订了750吨供货合同。

关菊说，这在当时是鞍钢批量最小的供货合同。但是，鞍钢对质量一丝不苟的要求赢得了用户的信赖。如今，鞍钢成为这家企业唯一的优特钢供应商。

“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国内企业使用的30个优特钢品种，鞍钢已经能生产28个，而且每年以2万至3万吨的数量递增。”关菊说。

鞍钢钢铁研究院汽车用钢应用技术组15个人，12个是“80后”，组长林利今年36岁。因为他们是提供技术服务的，不开发新产品，因此，开始并不享受鞍钢集团公司的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输出“分享制”。然而，鞍钢无论开发出什么产品，最后都得靠他们推向市场。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2016年也将他们纳入“分享制”之中，比如为汽车生产企业提供技术认证视为技术输出，可享受净收益的50%。

小伙子们个个热情高涨，我国有6大汽车集团，他们一家家了解新产品开发信息，在新产品设计过程中就主动参与进去，帮助提供所需钢材质量、性能、用量等信息，并形成完整的方案交给生产企业，同时进行技术讲解。

林利说，他们为一个企业搞成一个技术认证，就可带动这家企业购买鞍钢10-15种钢材产品。现在，6大汽车集团都用上了鞍钢钢材。

站在实现“中国梦”的舞台中央

展现风采，搭建职工交流学习的平台

“坚守这份工作，是因为大家需要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价值呀。你应该像扁担那样，有韧劲儿啊。”讲述者是山东省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一处的掏粪工陈国瑞，他从老班长手中接过的一根挑粪扁担。正是在挑了28年大粪的老班长身上，他明白了：一根扁担可以挑百斤重担，当你挑在肩上的那一刻，有一种责任也扛在了肩头。

为了扩大比赛影响力、增强比赛互动性，让更多不在现场的职工也能感受到“平凡的力量”，全总、工人日报、中工网微信公众号、中工网PC端对决赛进行了全程直播。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两微一端直播、转播，覆盖职工逾亿人次。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工网等国内各大主流网站及商业门户网站均参与了报道或转载了相关内容。

近日，河南郑州市民张先生发了一条朋友圈，分享自己陪母亲看病的经历，医师开了3片朴尔敏，仅花费两分钱的经历。这则“两分钱处方”的消息引起网友热议，那位医师也被

网友们称为“中国好医生”。(见8月21日《大河报》)

药费仅两分钱，这在动辄几百上千元的看病买药语境下，让人倍感意外。患者和网友大呼惊讶的情形，折射出现在现实中略显“过敏”的医患关系。

从对症下药的角度看，“两分钱处方”并不奇怪。诚如该医师所言：“在平时工作中，开几分钱、几毛钱、几块钱的处方是常有的事，因为医生的本职就是治病救人，为患者开药是根据患者的症状找出最合适的方法。”

对于“两分钱处方”，的确不应过誉或神化。

现实中，并非所有疾病都能通过小处方检查和治疗。很多病症的隐蔽性较强，即使做了相关检查也未必能够立刻确诊，况且有些不同疾病的表现在症状大体相同，所以需要肉眼和仪器的相辅相成，医生让患者做些检查实属必须，不见得就是“钻进钱眼”的过度医疗。但也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和医院存在“能开贵药就不开便宜的”、不需要拍片却非得拍片等情况。这就说明，缺乏良好的医患信任，“两分钱处方”就容易成为“神话”。

(上接第1版)

历经初赛、选拔赛，遴选了一大批优秀的职工“演讲高手”，由各省(区、市)总工会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铁路、金融工会组成34支代表队、共68名优秀选手参加了7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决赛，并从中角逐出12名选手进入总决赛。

从1月到8月，中华大地上响彻“中国梦、劳动美”的声音：

——在重庆，40个区县、7个产业工会层层组织开展了6000余场演讲比赛，覆盖5900余家机关、学(院)校、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等，近10万名选手参与到活动中来。

——在陕西，各级工会举办了1100多场演讲比赛，吸引了各行各业2万余名职工参加。

——在天津，61个区总工会、局集团公司工会选拔推荐的112名选手参加选拔赛，涵盖了能源、教育、卫生、交通、政法等多个行业……

另一个原因在于商业的需求刺激产业链上下游。数据显示，贷款理财、违规放贷和房产中介是拨出骚扰电话的“重灾区”。这些依靠广泛推广、需要高频次拨打电话的行业，一方面催生了职业化、团伙化的

骚扰电话“回潮”，监管手段不能滞后

杜鑫

据《新京报》报道，近期骚扰电话呈“回潮”之势：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网站自今年4月份以来，涉嫌骚扰电话举报次数有明显增加的趋势。骚扰号码涵盖手机、座机、95号，有呼叫中心每人一天拨打800个电话，而花500元就可以从网上买到1万个部分真实的北京手机号码。

骚扰电话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百度资讯显示有超过25万条相关新闻。问题是，近年来，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骚扰电话，为何投诉却越来越多？

12321网站的数据报告显示，7月的涉嫌骚扰电话举报次数突破了6万件次，而去年7月只有1.6万件次。投诉越来越多至少可以说明：

一方面，骚扰电话确实久治不愈，严重影响人们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积极参与打击骚扰电话。

骚扰电话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界定，目前相关法律条文中还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骚扰电话。因而，如何界定、处罚、商业营销和骚扰电话之间的界限在哪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另一个原因在于商业的需求刺激产业链上下游。数据显示，贷款理财、违规放贷和房产中介是拨出骚扰电话的“重灾区”。这些依靠广泛推广、需要高频次拨打电

话的行业，一方面催生了职业化、团伙化的

骚扰电话“回潮”，监管手段不能滞后

杜鑫

据《新京报》报道，近期骚扰电话呈“回潮”之势：1